

專家與政治

陳之邁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叔永

學術研究的途徑

周先庚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陳序經

蘇俄旅行記(十一)

丁文江

雙週閒談(三)

明生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六號

日一十月一十年三廿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熟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大衆書局 生活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瓊州	海山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濟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吉昌書局 荷澤 濟南書局 文倫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蘇州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宣化 小書報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新安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甘肅書報社 咸陽 現代文化社 成都 文書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重慶 東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開明書店 廈門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長沙 衡州派報社
----	--	----	---	----	-------------------------------	----	--

專家與政治

陳之邁

考試院爲確立及推行我國的考選銓叙制度，特於十一月一日召集全國考銓會議。與考銓有關係的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及國立大學均被邀請派代表參加，其外尚有專家十人被請加入討論。我們想借這個機會討論一下專家與政治的關係。

考試本是我國往時登用官員的辦法，孫中山先生鑒於這個辦法有保存的價值，故把它列爲五種治權之一。在建築大綱裏他說：「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這個原則同時也是根據於他「權能分開」的理論。他所謂「能」是應由具有專門智識及技術的人去担任，因此他又說：「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現代的國家職務日趨複雜專門，他這個原則當然值得擁護；考試院努力於這個制度的確立及推行，自然也應該贊揚。

改革目前的吏治應從消極的及積極的兩方面着手：消極的方面是想澄清吏治，廢去任用私人的弊病；積極的方面是想登用專門人材，增加政府的效率。實行考銓制度只

能使我們達到消極的目的；積極方面尙要想別的法子。

討論這個問題的第一要義是要明瞭什麼叫做政府裏的專門人材。政府裏的專門人材是對於政府某一個問題懂得最多的人。他的智識不能靠讀書得來，因爲寫他所讀的書的人便比他懂得多。因此他的智識一定要靠實際的經驗。他在政府裏服務，專門管理一個小問題的事務，經過長期間的研究及實行，他便比起任何人對於那個問題都知道得多，他便成了專門人材。

我可以舉一個外國的例子。前幾年我對於英國的「委任立法制度」很發生興趣，於是費了三年多的工夫寫成了一部小書。同時有一位美國的教授也對那個問題發生興趣，費了幾年的工夫也寫成了一部大書。後來我們在倫敦晤著，相約去見英國「立法委員會」專門管登記「委任立法」的那個官吏，把我們的書送給他看。過了兩天他請我們吃飯。席間他說：「你們的大著我已經拜讀了，以外國人而能研究我們的制度，并有這樣的作品，可算難能；但是據我看來，你們對於這個制度仍然非常隔膜，你們知

道了法律，但尙不能知道法律執行的實際情形。實際情形不是讀書，翻檔案，查法律便可知道的。要緊的是要有執行法律的經驗。我在這裏管理登記已三十餘年，故我敢向你們說經驗的重要。」說完了之後他便述說他的經驗。

這一席話使我們覺得他可以算得是一位專家，他可以說是對於「委任立法」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英國中央政府裏共有三十五萬個員吏，其中許多都是同這位先生一樣專門的。法國中央政府裏共有五十五萬個員吏，美國共有六十萬個員吏，當然其中也不乏名副其實的專家。這些人是政府的基礎。他們的升降遷調有充分法律的保障，他們的薪俸相當優越，退休時也有豐裕的養老金。他們不與政潮同起伏，政府只管更替，他們是永遠存在的。政府裏的要員向來要仰賴他們的幫助，他們供給材料，建議政策，說明政策之是否可行，草擬法律案。他們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政府之所以能不因為政府的更易而中斷便是因為他們的勢力。所以有人說：「員吏是犧牲了虛榮來換取實權的人。」

這些人誠然都是經過考試而來的，但是所考的都是普通的常識，不過是試驗他們有沒有變成專家的可能便了。至於真正專家的養成尙有待於實際的研究及經驗。因此我

們如果想建造一個良好的員吏制度，考試固應十分注意，但是只有考試是不夠的。除了考試以外，我們尙需注意給考取任職的人變成專家的機會。這種機會的造成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我們應該給員吏以充分的保障。我們應該竭力廢除任用私人的辦法，員吏的地位應使其極度的穩固，與政潮完全脫離關係。政府的更替應與員吏的飯碗絕不發生影響。在這種穩固的環境之中，他們才可以慢慢地變成專家。

第二，我們應該給員吏以比較舒適的待遇，薪俸相當的高，任職多年後有充裕的養老金，使他們對於生活不發生憂慮。

第三，政府的官員及社會人士應該尊重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努力於研究他們所管轄的事務。

第四，我們應該設法避免遷調。為鼓勵成績優良的員吏，不妨增加他們的薪俸，但不可在他們管轄一種事務正感興趣的時候忽然把他們調開去管轄另外一種事務。如果員吏對於問題真正發生興趣的時候，即使叫他升官，他也未必願意的。

如果除了考試以外，我們可以辦到這幾層工作，幾十

年後，我們便可以把政府的基礎建造起來，「專家政治」或「技術政治」的目標便可以希望達到，政府的效率便可以提高。茲值考銓會議開會的時候，此層特別應爲國人

所注意。大學畢業的人不能算是專家，文官考試錄取的人也不能算是專家，他們如果這樣自命不凡，那是妄自尊大。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叔 永

這幾天來，似乎世界上保存古物的空氣特別濃厚。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既然在世界政潮崩騰未已的時候，拿出一些閒情逸致來成立一個古物保存委員會，我們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也應時在內政部正式成立（見十月二日各報南京專電）。這可見中外的政治家都在那裏大發思古之幽情，要爲人類保存一點文化的遺跡，我們爲文化前途計，爲古物本身計，是應該歡喜贊嘆的。可是就我們的經驗看來，覺得紙片上的古物保存是一事，實際上的古物保存又是一事。這已經夠使人對於報紙的喧傳，有隔靴搔癢之感了。再壞一點，有些古物簡直爲有保管之名，而得到毀壞之實，則我們對於保管委員會的組織而愈加要替古物擔心。這并非無病呻吟，讓我舉一個眼前的實例來說明。

在北平的古建築，在歷史上富有意義，在美術上特出不羣的，自然要推天壇了。這地方，是世界各國到北平來

遊覽的客人，無一個不前去觀光的。但是這個地方近年的荒蕪，敗壞，簡直使人感到牠是不是一個荒村野寺，除了樵夫牧童之外，曾經有人加以注意。不，我說無人注意，實在不大準確。我們記得在三四個月以前，曾經爲天壇內的古柏被人盜伐了若干株，內政部特派一個司長前來密查，甚至監察院的委員也有提出彈核案的傳聞。這個案子的結果怎麼樣，我們未見政府的公布，不大明白。可是我們所大惑不解的，是天壇幾株古柏的盜伐，雖然曾邀政府的注意與查究，而天壇全體幾千株柏樹的枯死，反而不能得人們的注意，這難道真是孟子所說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興薪』嗎？讀者若是對於我上面的話還有疑惑，我現在可以把我親身的經驗再來敘述一下。

我有兩三年不逛天壇了。本年的雙十節，天氣很好，我於是同了太太，帶着小孩們到天壇去賞賞秋色。到了那

裏，第一件使我們驚駭不置的，便是那些自來青翠欲滴，一望無際的古柏，現在都葉落枝枯，現出一種憔悴可憐的樣子。大概說來，你若不詳細的觀察，你幾乎要疑心柏樹的數目減少了一半。這些柏樹若是沒了，所謂天壇的名勝也就掃地無餘了。我於是急急忙忙的在祈年殿皇宮宇等處旋繞一週，發見枝葉青葱，生氣蓬勃的古柏實在少數又少數，其餘的可以說都是奄奄待斃的了。我想這些古柏的壽命，多則幾百年，少亦數十載，何以到了此刻，忽然來了一個大瘟疫，竟沒有幾株能作一次生存的競爭？我幾乎不能信自己的眼睛，回來又託了生物調查所的幾位專家前去視察一番。據專家的意見，這些樹木，的確是害了一種蟲病。這蟲由樹皮鑽進去吃了皮底的樹脂，那樹的枝葉便不能不萎死。現在天壇的樹木受病已深，若不設法救治，大有同歸於盡的危險！

我們特別提到樹木，一則因為樹木的受病，是我們此次首先發見的；二則因為樹木是活着的東西，要保管應該不算很難，現在樹猶如此，其他待人培補修理的建築物更可推想而得了。天壇是遊踪屢及，觀瞻所繁的地方，天壇猶如此，其他的古蹟更可想而知了。

我們看了這些古物的毀壞，不能不問一問負保管之責

的是誰。我們曉得，北平的許多壇廟，雖然在北平市區內，而是歸內政部特設的壇廟管理處管理的。爲了故都的幾處壇廟，要特設一個機關來管理，已經夠不合理了，至於管理的成績，又壞到如此，我們真不曉得要這個機關何用。老實說來，若內政部把這個機關裁撤了，而把在北平市內的壇廟通通交與北平市政府管理，不但內政部可減省一筆經費，而且管理的成績一定還比內政部管理好。我們這是一個主張，根據以下的理由。

一，地方政府對於本地古物的保存有直接利害關係，不如中央政府有鞭長莫及，漠不相關的感覺。

二，地方政府對於管理的善否，可以隨時監督，不如中央政府名爲直接管轄，實則委託一個不負責任的小職員，難望其盡心任事。

三，由地方管理，地方人士對於古物保存的情形，可以隨時向地方政府建議，不如由中央管理，則地方人士大有呼籲無門之苦。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以爲要保存北平幾個重要古建筑，則改組管理機關，由中央移歸地方，實爲第一要義。

我們以爲保存古物一類的工作，看去雖似不關重要，實則我們若要向世界証明我們中華民族還不完全如有些外

國人所詆毀的半開化或未開化，我們若要向世界証明我們中華民族還沒有墮落到連先人的一點手澤都不肯保存，不能保存，則保存這幾件撐持文化門面的古建築物，亦不失爲一個簡便而便宜的辦法。

學術研究的途徑

近來國內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的風氣，可以算得濃厚極了。自從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後，政府或私人學術機關與國立或私立各大學，都先後爭設研究院。不但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似乎也特別想積極造成這種研究實驗的風氣，（例如政府特有「縣政建設研究院」與「實驗縣」的創辦與設立）。這種尊崇研究實驗的風氣，一方面固然很好，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三個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可不注意。第一個問題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到底是要集中於獨設的研究院呢，還是要集中各大學？關於這個問題，孟真先生在本刊一〇六號已有討論，我現在略微補充一點個人的意見。

（一）孟真先生主張：「大學要辦研究院之前，有一先決條件，即大學本身先要充分的實行講座制」。這是很妥

我們趁內政部成立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機會，鄭重的提出一個實際具體的建議，希望誠意保存古物的大人先生們加以注意。

二十三，十一，三。

周先庚

當的辦法，凡是大學中尚未成立研究院的，都應當照這樣辦理。「講座制」的精神是以學者個人爲單位。一人有需要，有興趣，有能力指導一群學子，造成一個「小窩巢」，應當毫不嫌忌的讓他去發展給他一切方便。目前大學中研究院的失敗，即在太忽略「研究是個人的」這個事實。研究院的產生應當由少數有心得的教授慢慢演進發展，他必須先有具體研究成果發表，已得一般社會人士的認識，且能吸引研究學生，然後始可請求設立研究院，或增添「後畢業級」課程。但是過去大學中研究院的設立，每每是爲設立而設立，研究不研究不問，有無具體研究成果發表也不管。大家不能以學者高尚謙獻的風度（Intellectual Sportsmanship）相安，而每每爭得「研究教授」或「導師」的美名，這是不好的。一般大學教授「兼領點」忙功課已

無暇，尙有何時間去專心于研究工作？何況有許多行政人員，同時，又兼「研究教授」或「導師」，未免把研究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大學在未設立研究院之前，應先儘量鼓勵少數性近研究而不近行政教學的人，去埋頭研究而毫無嫌忌之心。

不過若要這樣的養成「講座制」，在目前中國大學裏，非得先提高學者高尚競獻的風度不可。我們知道在歐美國大學中，教授的等級很多，大家也能相安，而在中國教授猶如「上將」，人人皆是。一個剛得博士的留學生一回國即與以教授之名。即有正副之分，也是一律正的，或一律副的。教授等級之分，尙有事實上的困難，若提倡「講座制」，成立「某某人的研究所」，「某某人的實驗室」，那不是更困難了嗎？所以我覺得大學設立研究院，固然「應當先使得大學成大學，即澈底的建設大學中的講座制」，但是「講座制」的先決條件，則爲學者高尚競獻風度的養成。

(二)孟真先生提到：「大學之研究有不及專作研究機關之便當處甚多，凡一事之需要較大量的設備，大規模的組織者，在大學各科並立的狀態之下，頗難得一部份過分發展」。這種困難還是心理的。學者若有高尚競獻的風

度，畸形發展是可以有的；學術研究若以個人爲前提，一部份過分發展，我們應當毫無嫌忌的容納。學術根本不能講平等，因爲人才不齊，研究能力不等，學者個別差異甚大，平均發展，就等于平均耗費。我們看歐美各大學，有幾個是各科皆好的呢？甲大學甲科著名，而乙大學則乙科著名；根據各大學的師資財力與背景，通盤籌劃，總有些科目應當特別發展，有些科目應當酌量減縮。大學本科尙且應當如此，何況研究院呢？所以這一層不足爲慮。

(三)大學研究院的設立當以「訓練大學本身之高級學生爲重事，而不當以「招收研究生」爲專務」。設若我們承認研究事業是學者個人的問題，而非形式組織的問題，那麼大學研究院的成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自然當以教授爲中心，而不能以研究生爲轉移了。若以研究生的立場說，目前的大學畢業生有繼續研究必要和能力的很少，所以大學研究院事實上變成了「養老院」。不過這是因爲教育部高級學位法還未頒佈，社會上也不鼓勵大學畢業得高級學位。設若將來高級學位法一旦頒佈，社會上對於獲得高級學位的研究生能夠另眼看待，研究生入研究院研究的專心誠意自然可以担保的。人類求智識總得有相當代價，研究二年三年，不單入社會并無特別優待，連一個空「碩士

「博士」的虛名都得不着，怎能怪研究生兼職觀望呢？大學本科的基礎訓練與啓發固然重要，「後畢業級」的訓練與啟發，在將來學位法頒佈與社會承認高級學位的資格之後，也是同樣的重要，到那時候大學研究院似乎很有必要了。

（四）大學研究院的設立，既以教授爲中心，理想上「在教育部允准各大學設立研究院之前，應先組織一個大學教員資格審定委員會，專以著作定大學教員之資格，其尤有學術供獻者，方得許爲正教授，即執行研究院指導之任務者」。這還是心理的問題，還是中國人缺乏高尚貢獻風度的問題。大家已經一律是正教授了，誰配審定誰的資格呢？若專以著作與學術供獻爲標準，那是很爲難的。目前我們如何養成學者高尚獻的風度，使得大家能甘心受審定而彼此相安——這是極堪注意的問題。

我覺得獨設的研究院與大學的「畢業院」（可以不必有研究院的形式）應當分工合作。獨設的研究院不應當重複大學的設備與人才，他應當作大學中所不能作的普遍的大規模的研究實驗，大學則可以作特殊的小規模的研究實驗。獨設的研究院還應當與大學合作，交換研究教授，使得雙方的利弊都可以互相補益。

第二個問題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在目前的中國，是否應當專門注重實際應用而忽視純粹理論？一二年來重理工輕文法的風氣，似乎是政府確定的積極政策，一般學者因而隨之輕理論而重實用。學生每每不顧性之所近，專趨潮流，羣擇理工，因而失敗煩惱。最近唐肇黃先生在八月創刊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中「論中國學術界最近的風氣」，已經指出這種趨勢不能縱之太過。但是九月十二日大公報社評似乎明確的主張：「論到研究院所研究的科門，則無庸多取較切應用的題目爲合宜。純粹科學理論，祇好還是讓西洋先進科學家去探討。」我覺得這種主張未免太忽視學者的個性，根本違背現代心理學的「個別差異律」了。

學者活動的動機至少有三大類：一種是爲求智識，結果產生一切純粹科學；一種是爲供賞鑑，結果創造一切文學藝術；一種是爲圖實用，結果發生一切專門技術。現代科學的實驗心理學確實告訴我們：人類「個別差異」的事實，非常重要。幾千年來，人們都忽視人類本身相互間的「個別差異」，只注意一般普遍的原則或現象。即在心理學科學實驗化的早年，翁德一般先進實驗心理學家，還是主張心理學的職責，僅在發現一般普遍的原則或現象。

不過到高爾登，卡泰爾一班人，人類個別差異的原則，遂普遍的爲學者所公認了。所以後來才開二十世紀一切應用心理學的門徑。我們要知道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的途徑是什麼：全恃學者的性格而定。一個人根本興趣只在求智識，爲科學而科學，社會輿論是無法改換他的個性的；一個人根本努力只在供賞鑑，爲藝術而藝術，理智裁制也是無法轉變他的傾向的；一個人根本熱心只在圖實用，爲技術而技術，鼓吹提倡也是無法推翻他的成見的。

一位當代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說：「所有的人類對於宇宙一切事物，天生自自然然的抱着至少三種不同而且矛盾的態度，就是求智識，供賞鑑，圖實用的態度……對於生活中許多事情與宇宙間許多物件，我們常常爲不同的目的在不同時候取這三種主要的態度，……所有的人都要求智識，供賞鑑，與圖實用。這三種態度沒有那一種是比其他二種更重要，因爲沒有那一種是可以代替其他二種的。常態的生活即在于這三種態度的均勻保持」。人種既然有此三種不同的態度，而我們又不能強人一律（這是違背心理學「個別差異律」的），所以主張凡是學術研究或科學實驗都應當一律注重實用或理論的是不對的。

大家既承認因爲「現代科學並沒有產生今日的歐美，

反之，都是歐美的「頭腦」才生育出現代科學與技術，」我們格外要同時均勻發展純粹科學，文學藝術，與專門技術，我們格外要鼓勵學者與青年及早養成爲研究而研究，爲實驗而實驗的精神。我們的目的不是在于科學原理上的速獲，而是在于此種精神的養成。正因爲此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奇效的，所以我們更當鼓勵他，不能反而忽視他，把「純粹科學理論祇好還是讓西洋先進科學家去探討。」況且事實上中國二十年來純粹科學的貢獻，在世界上并不是沒有地位的，（參看胡適：大公報十月十四日星期論文「悲觀聲浪中的樂觀。」）我們這一點萌芽如若不繼續鼓勵，難道要等至我們的「頭腦」自己自然成熟歐美化嗎？我們不能指示研究院研究的科門一律屬於實際應用的，正如同我們不能示意學校中所教授的科目一律屬於純粹科學理論的一樣，因爲學者不同態度的活動根本就不可能分爲學校的與研究院的。學校中的教員學生有個別差異，研究院的導師研究生也有個別差異。我們只可以勸導或指示性近于純粹理論研究的去作純粹理論研究；但是性近于實際應用的必得特別努力「多將視線轉移到關於中國的應用問題上來。」

第三個問題是究竟什麼是「研究，」什麼是「實驗？

「研究」二字本是很寬泛的，現在「縣政建設」也有「研究院」，他的意義更寬泛不堪。「實驗」二字在自然科學中，意義極是具體的，但是一縣也可以「實驗」，那就有些捉模不定了。

有一位批評家討論到美國大學中的研究院時，關於「研究」的正反二面的定義，說得很清楚。他說：

「收集材料——雖然準確——不算研究。家政學，社會科學，與教育學，常常累積敘述的材料，不算研究。未分析與不可分析的材料，無論如何精巧的堆集在一塊，不能算研究；報告不是研究，調查不是研究；商店女招待，打字員，飯舖女招待，教務長，破產者，訴訟者，學校裏，快樂的與不快樂的教育學學生，以及不知道愛父親多還是愛母親多的新生——凡是這些人同情的敘述，不管有圖無圖，有曲線無曲線，有百分數無百分數，都不是研究，除去在美國而外，無論何處都不能承認他們是研究。」

「那麼，什麼是研究呢？他是一個人自己在某一時期用盡他的心思與可能的儀器和原料去冷靜的，辛苦的努力求真理；——雖然學術合作是允許的，但是不能由他僱人來做。所研究的問題，一定要關痛癢，而且要有意義；研究的目標應當清廉不偏，無論結果如何影響財產，收入，或

是個人嗜好，觀察研究的人一定得保持客觀的態度。在物質科學與生物科學中，控制是在最嚴厲的條件之下辦到的；可能的預測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科學中，控制無預測就不大行了。所以有人根本懷疑社會科學究竟是否科學。我們姑且假設他們是科學。正是因為他們有這種困難，所以我們更當認真慎重的去批評他們。一味的測量，調查或累積材料與事實（有時或者竟不是真事實）每每白費時間精力與金錢。自然有許多問題現在祇能用歸納法去研究；一個研究者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科學的精意即在於研究者要有一點有價值的意見。設若事實與這意見衝突，他就得立刻改變或拋棄那個意見，但是不斷的數記測量決不會產生理論，原理或意見的。」

這一位對於美國大學研究院中碩士博士式的研究（實驗也在內）的批評，我個人是很表同情的。因為我親自感覺：譬如心理學的研究與實驗，大半都是些不關緊要，毫無意義的枝葉問題，對於普通人，一般人不能激起信仰，引起重視。把常識現象用專家的熟語來解釋一番，明知一個現象是如此如此，偏偏要試來試去，看他到底還是如此；手敲敲，嘴數數，然後來算算多少，畫圖列表，于是就到專門刊物上去報告那所謂的「發明」「發現」了。當代一

位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說道：「以前在德國有一個時期，一般人對於『心理學』的小題大做，專在小處不關痛癢的地方，吹毛求疵，人都引以為笑柄。」這個時期，我敢說到現在還未終止；一般人還是照樣嘲笑心理學家與心理學的研究與實驗。不單德國如此，美國格外利害。

不過在目前的中國，一般號稱研究實驗的機關，專家或學生，根本連歐美那種客觀的歸納精神尚未養成，我們是不能像上頭那樣的消極批評，一味藐視客觀材料的收集的。具體數量的事實與材料，是一切研究實驗的張本。一個真正科學的研究或實驗，能有驚天動地的假設或意見固好，但是主要的特徵，還是在於根據特意收集的材料，求得歸納的結論。一個研究實驗包括五種原素：（一）要有明顯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是意見還是假設，必須可以問：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或正或誤，或當或不當；換句話說，必須要非常具體，非常縮小範圍，可以實際解決。空空洞洞，茫無邊際，未曾分析過的問題，是不能研究實驗的。（二）要有控制因子的方法。具體的問題需要嚴密的方法去控制不相干的因子，不能隨隨便便在自然環境之下隨意觀察就可了事。（三）要有精確數量的材料。研究實驗的數量材料是張本，是憑單，沒有他不成其為科學的研究

或實驗，隨便試試得到大概的結果，就忽略材料張本的系統陳列以待審查，那是不行的。（四）要有精微公允的分析。得到系統材料以後，問題的解決能到何地步，控制有何缺點，材料有何不正確之處，統統須明白老實地指出。（五）要有果斷確切的結論。根據現有的材料張本，經過分析討論之後，原擬的問題是否解決了？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或正或誤，或當或不當，均須毫無顧忌忠實不苟的報告出來。不能因結果是反面或與原來所料想的不合，即忽而不提。

一個研究或實驗經過這五個步驟之後，研究實驗者還有責任筆之于書，認真的報告出來，使得大家都能考查他的經過，估量他的得失，就好像會計師審查一個會計的賬目一樣。我覺得要嚴格的說，無論什麼研究或實驗，非如此不足以稱為研究或實驗。述作習作或者是研究，但是重複人家一個原始的問題，特別避免調考研究報告，有意或無意容納讀書暗示，來重行証實人家的結果，不能算是第一等的研究或實驗。自己暗地七摸八摸，東湊西湊，隨意得到一點見解，別人無法查考，無法照樣重複証實，不能算得嚴格的研究或實驗。

學術研究的途徑是很多的，學者的「個別差異」也是很

大的，不單特設的研究院中人員需要學術研究和科學實驗，大學教授也有這種需要。兩方面應當分工合作，利弊互相補益才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除非有特殊教育，根本改造未來青年的個性，態度，與興趣，我們是不能免強大家一律都圖實用而忽視純粹科學理論的探討的。研究與

實驗的意義與要素，在目前似乎用得太空泛不確定了。我們應當有嚴厲與論的裁制，不可使研究不成其為研究，實驗不成其為實驗。

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于清華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陳序經

在大公報十月十三日登載鄉建工作討論會在定縣開幕詳紀裏，我們找得梁漱溟先生下面一段講演詞：

……鄉建的目的：（一）從中國固有的歷史，演變下來的，使中國成為高度文明以鄉村為主體為根據的社會；（二）西洋的近代文明，與中國固有的文明，結合演成今日狀況。西洋的都市文明，工業文明，與中國的鄉村文明，農業文明，兩相接觸，改造一種新的環境，在不斷的轉變之下，成為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成為我們今日的鄉村運動。我國經過不少運動，惟此運動，切重實際，亦可謂之最後的運動。已往諸運動，初起時亦呈風起雲湧之勢，但漸漸失敗。……中國原以農業立國，自

受西洋工業文明影響以後，也想走入西洋之路，但未走通；如已走通，固無需再有今日鄉建運動矣。

如日本因種種條件適宜，故摹仿工業文明而成功，走上了工業文明，都市文明之路，所以無需有鄉建運動，農村受都市壓迫過甚，故偶然的需要救濟，但談不到建設。我們因無路可走，才走上鄉建之路，開闢一個新路線，以農村為主體來繁榮都市，……開闢世界未開闢的文明路線，以鄉建工作為民族自救的惟一出路。

在梁先生這段話中，可以商榷之點很多，但我在這裏所要把來討論的是：他以為西洋文化是都市文化；中國文化是鄉村文化，而且這兩種文化接觸起來，就會產生出一

種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我們的意見是：所謂都市與鄉村，從文化的觀點來看，不但是在性質上，不過是文化很多方面的兩方面，就是在發展上，是要在文化較高的社會裏，纔能發展的。因此之故，在一般經濟學者所謂漁獵以至畜牧時代的社會，城市固是難於發生，連了梁先生所謂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也是難於發生。

不但這樣。鄉村的發展固多依賴於農業，然而有了農業的社會，未必一定是以鄉村為社會的基礎。比方南方好多的苗黎和南洋好多的土人，所住的地方，在很遠的距離中，纔見了一家茅屋。所謂鄉村固是少見，就是三五個家庭聚居一處，也不多有。然而這些的人們，大多數是靠着農業為生，同時他們的農業的知智和經驗，未必是低過我們所謂以農立國的國民。

同樣，都市固是工業的展覽處，可是都市尚未發生或發達的原始社會，工業也許已很進步。比方美洲土人所製作的土器，非洲土人所鑄造的鐵具，苗黎的刺繡，以及他們或其他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工業的其他方面的出品，在人類文化史上所佔的位置，都很重要。

都市與鄉村既不只是文化很多方面的兩方面，而且是

要在文化發展較高的社會，或是某種特殊的文化的社會裏，纔能發生或發達。我們就能容易明白文化可以概括都市與鄉村，而鄉村與都市却不能概括文化。梁先生以都市與鄉村來範圍文化，已經不合邏輯，何況就算都市與鄉村可以範圍文化，則西洋文化既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國文化，也非只是鄉村文化呢？

原來西洋現代的文化，並非突然的發生或創造出來的。牠是經過好多年的時間，和費了無數人的精神勞力，一點一點，和一步一步的累積而成的。所謂二十世紀或十九世紀的西洋文化，不外是十六七八諸世紀的文化的伸張；而十六七八諸世紀的文化，又不外是從西洋文化發生以至十四五諸世紀的文化的果實。都市是文化特性之一，當然也是像文化一樣的發展而來。所以從大體上看起來，西洋的都市歷史，也有了好幾千年的久遠，然而從其發展的速度方面來看，這種速度的增加得利害，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我們知道一八〇〇年的法國的人口過十萬的都市，不過有了三個。在那個時候，紐約大約只有六萬人，倫敦不過十四萬左右，巴黎是歐洲的重心，也不過是五十萬左右；芝加哥到了一八三〇年，還不過是一個百人左右的鄉村。此外在今日所謂為大都市，在一八〇〇年有的還是荒

邱曠野，有的還是窮鄉陋邑。所以一八〇〇以前的西洋的人民，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在所謂鄉村裏過着他們的生活，我們若用了梁先生的名詞來說明西洋文化，那麼這時候的西洋文化，豈非也是鄉村文化嗎？然而一八〇〇的西洋文化，老早已進入現代文化的時期。

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洋都市，有了一百萬人的，固不易找出來，有了五十萬以至十萬的，還是無多。紐約成爲美國最大的都市，人口至多也不過五十萬左右，芝加哥只有五萬；巴黎據說有了一百萬，可是在法國那個時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鄉村的居民，於是可知西洋的文化不只是都市的文化。

而且事實上，近百餘年以來，西洋的都市固是發展得很快，西洋的鄉村何嘗又沒有發展呢？一般淺見的人，見了紐約倫敦巴黎柏林芝加哥的人口，在這個時期裏增加了好多倍，他們忘記了西洋各處的鄉村的人口，在這個時期裏，也增了不少。舉一個例罷。一八〇〇年的英倫與威爾士兩個地方的人口，總數是九百萬，住在都市的有了三百萬左右，住在鄉村約有六百萬；到了一九〇〇年這兩個地方共有人口三千萬，住在都市的約二千萬，而住在鄉村約一千萬。這個統計雖也指示都市的發展是較鄉村的發展爲

快，但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鄉村並不因都市的發展而零落。反之，鄉村的人口，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何況事實上，今日之所謂爲都市，大數是從前的鄉村；所以表面上，我們雖說鄉村發展和都市發展有了分別，事實上，所謂都市的發展，差不多也就是鄉村的發展。

同樣這般淺見的人，只見得新的都市在這百餘年以內，增加不少，他們忘記了在同樣的時期裏，新的鄉村也增加了不少。他們只見得西洋在這百餘年來，都市的物質文化，進步得很快，他們忘記了西洋在同樣的時期裏，鄉村的物質文化，也進步得很快。他們只見得都市人口增加得快，鄉村人口增加較遲，以爲後者就被了前者壓迫，他們忘記了機器發明以後，從前要十人來耕一幅地，現在只用一個人就够了；他們又忘記了，交通便利以後，所謂鄉村與都市的界限，已不像從前那樣的清楚，居住鄉村的人，固有不少跑去都市，然而居住都市的人，也有不少的去鄉村。

再從西洋文化性質來看，一般人——梁先生也在內——都以爲科學及民治爲西洋文化的特徵，但是科學對於都市的發達上固有不少的幫助，其對於鄉村的發達上，又何嘗沒有很大的貢獻？例如交通上種種便利，與其說是有益於

都市，不如說是更有益於鄉村。至於民治精神與制度之發展，差不多可以說是以鄉治國的表徵。在帝王專制的時代，政治完全取決於國都與都市，在民治時代的國家，政治主權，是要在一般民衆的手裏找出來，現代國家的鄉村的民衆，既還佔相當的數目，則鄉村之在政治上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

上面是說明西洋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我們現在可以解釋中國文化不只是鄉村文化。

易云：「日中爲市」，這可以說是中國都市的起源；周禮裏國與鄙每相對稱，鄙是指着鄉村，而國却可以說是都市。至於管子說「野與市爭」，已經證明市的位置的重要。又如公羊傳宣十五年何注文說：「春夏出田，秋冬入城郭」，是指出都市不但是政治工商的中心，而且是農民的秋冬兩季的寄託所。至如秦的咸陽，漢的長安的位置的重要，更不待說而可以明白的。漢代文化的中心，是在黃河流域，故史記貨殖傳載長安以外河南有七個大都市，直隸山東山西安徽諸省各有兩個；南方文化較低，故都市之見於貨殖傳者，僅江蘇湖北廣東各一。於是可知中國的文化，從來就不只是鄉村文化。而且從貨殖傳裏的指示，我們知道文化之優高低下，每以都市之大小多少爲衡。

從漢朝至現在朝代雖變了不少，然都市在中國文化的位置的重要，是無可懷疑的。我們試讀元代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其所贊美歌頌的中國文化，何莫非像梁先生所說的「都市文化？」假使那個時候的歐洲人，而像梁先生一樣的把文化來分爲都市和鄉村兩方面，則讀了馬氏遊記之後，豈不是也要嘆道：中國文化是都市文化了！

梁先生既錯認中國的文化是鄉村文化，他又錯認中國成爲高度文化是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我們要問梁先生所謂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而爲成高度的中國文化，是指着那一種的文化呢？在物質方面，是不是以農業爲本的鄉村的農業出產呢？在社會方面，是不是以宗族爲本的鄉村的宗族制度呢？在精神方面，是不是以保守爲本的鄉村的只知道鄉不知有國，有世界；只知因襲，只知復古，不知進取，不知圖新的思想呢？其實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之所以停滯而不能發達的一個很重的原因，恐怕正是因爲中了這種鄉村制度的遺毒，和受了老子孟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鄉村的影響。結果是智識固塞，科學不振，工業商業固無從發展，連了所謂爲鄉村基礎的農業，也是沿舊蹈常，與所謂原始文化的社會的情況，相去不遠。至今無路可走，迫不得已的還要派留學生到西洋學農業，派大官紅員

去西洋調查鄉制，考察農政，購買農品，移植種子，我們清夜捫心，應該慙愧萬分，努力急起直追，企有與西洋並駕齊驅的一天，那料所謂鄉村運動領袖像梁先生，還要在那裏夢想以西洋人千數百年前所也會經過的中國式「農村文化」，而融合於西洋的現代文化，以成爲什麼一個新路線，新文化，豈非可笑！

事實上，我們相信新的文化的創造，與其說是依賴於鄉村，不如說是依賴於都市。上面已經說過，一般人都以爲現代西洋文化的特徵，是科學與民治，可是科學這件東西差不多完全是都市的產物。同樣，民治的發展也是得力於都市。法國所有的革命，都起自都市，而特別是法國最大的都市——巴黎。法國的革命是這樣，別的國家的革命也是這樣。在英國，在瑞士，民主政體的種子，人們雖說是他們祖宗在山林田間種下來，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的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工業革命以後纔發展的，而工業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都市。而且工業革命的發生，是由於機器的發明，機器的發明，又不外是科學發達的表徵。

所謂現代西洋文化的特徵既是都市的產物，現代西洋文化的高峯或梁先生所謂的高度文化也是要都市裏找出來。西洋固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中國都市的發達雖然

比不得上西洋，可是中國而真是有了高度文化，那麼這些的高度文化，也是「都市的文化。」我們的都市且叫做「國」，我們的鄉村是叫做「鄙」，已是表示兩者的文化高低不同。我們的鄉人會屢唱着：「不到京城終賤骨」的句子，可是我們沒有聽過都市的人唱過「不到鄉村終賤骨」的句子。我們有鄉下佬出城的笑話，我們沒有城上人下鄉的笑話。這不過是就我們傳統和一般人的觀點來說。假使我們從我國的文化本身來看，那麼無論在物質方面，在精神方面，都市都比鄉村爲高，爲優。所以外國人來中國觀光（？）時，我們要叫他去北平看皇宮，看花園，看四庫全書。萬一外國人到了我們的鄉下，照了幾張泥屋，豚尾，人畜共處，鬼神偶像的片子回去在西洋的影戲院裏開演起來，我們馬上就要抗議，以爲他們侮辱我們的國體民族。連了一般真是同情於中國一般民衆生活，農村概況的外國人，若是到了像定縣那樣的地方，我們所給與他們參觀的，也不外是在縣城裏或是縣城附近的西化的保健院，西化的農場……試問我們所謂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的中國的高度文化，又在那裏呢？是的，在定縣的農場裏，我們曾搜集了華北好多的家畜像雞像豬，和好多的農品，像麥像棉，然而把我們這些東西和西洋的這些東西陳列在一塊地方，三尺孩